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经济体制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编者按：怎样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下定义，如何确定融合的边界、内涵和外延，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大背景出发，从经营主体、融合机制和从产品科技等角度综合思考，以发展的观点，规划出相对科学的发展道路。

□ 刘明国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出的一项重大部署，也是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由于这一部署刚刚提出，社会各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需要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做出必要的回答。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意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央会议和文件中，是党的“三农”工作理念和思路的又一重大创新，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新常态下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根本选择。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新的加速度，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条件大幅改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好形势。特别是粮食“十一连增”，且连续4年超11000亿斤，提前近10年完成了国务院《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目标；农民收入“十一连快”，且增幅连续5年跑赢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不仅1998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近12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得以阻断，而且创造了1984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一次连续3年（1995、1996、1997）以上缩小的历史。成绩令人欣喜，但也必须看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很不牢固：从农业资源看，不仅空间潜力极为有限，而且部分主产区土壤地力长期透支、质量持续下降、重金属超标、地下水超采等问题突出，已对农业稳定造成了日趋严重的威胁；从农民收入看，在家庭经营受成本抬升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收益有限、农民外出务工数量和工资性收入增幅明显趋缓、转移性收入总量小增量少等因素影响，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面临极大挑战；从农村社会看，农业劳动力长期大规模向城市迁徙，不仅导致农村人才等资源严重流失，并引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工业和服务业的管理、技术、资本、人才等现代要素更多更紧密地融入农业，提升农业发展及资源利用水平；有利于扩大农村产业规模和就业容量，拓展农民就业增收空间；有利于聚集农村人气和改善农村人员结构，促进农村社会繁荣稳定。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顺应国内外产业发展新趋势的必然要求。从国际看，当今，产业融合已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建立在科技发展并不断融合基础之上的新型产业革命已风起云涌，正在带动社会经济系统日益广泛、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产业边界为了适应增长而日渐模糊或消失，全世界已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产业在不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快速发展。从国内看，在新常态新要求下，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深度优化调整，产业发展与国际接轨、跨行业跨领域融合发展的步伐空前加快。一些企业以互联网技术融合应用为突出代表实现快速崛起，吸引了国人乃至世界的目光。当前，在产业融合理念的先导性作用下，“互联网+”、“创客”、“众筹”等新概念迭出，其背后如影随形的无不是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产业形态和巨大而活跃的产业发展空间。具体到第一产业而言，近年来我国农业虽然在与第二、三产业融合上步伐有所加快，但总体上仍处在起步阶段，由于产业融合度不够，不仅在生产环节竞争力严重不足，而且在加工环节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在食用油加工领域，以打通全产业链作为最大经营之道的新加坡食用油加工企业益海嘉里，进军我国后已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小包装食用油市场40%左右的份额，大豆压榨能力占国内产能之首，并且在国内调和油市场价格上发挥着风向标作用，掌控着很大的话语权。在畜产品加工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顺应形势、应对挑战，迫切需要推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通过借势发展增强竞争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道路

结合我国国情，总结借鉴国际国内产业融合的实践经验，现阶段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农村为依托，以打通延长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为方向，以农业与关联行业间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管理方式的交叉渗透和优化重组为途经，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高度一体化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的过程。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涉及领域广、时空跨度大、工作任务重、现成经验少，需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机制创新、试点先行等基本原则。当前，重点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明确定位和要求。

明确融合的基点在农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角度和途径很多，但对我国而言，必须强调和始终坚持一定要把农业作为基点，将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务农就业增收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是农业和人口大国，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基本供给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农民收入问题始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点放在农业以外，最终可能会带动农业农村的发展，但也可能会侵害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屁股决定脑袋，站在不同位置就可能有不同的思维认知和行为结果。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只有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基点从一开始就明确放在农业上，始终把农业和农民放在突出位置，融合的方向才不容易出现大的偏差。

明确融合的关键在农产品加工业及休闲农业。除了农业以外，在二、三产业所关联的各种业态中，能够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很多，比如，科技、信息、市场等服务行业，以及工业企业等，但面对众多选项，我们需要坚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先抓住抓牢最重要的方面。客观分析，科技信息等服务行业进入农业，更多体现于对农业的支撑手段，起到的主要是辅助作用；工业企业进入农业，虽然会带来资金、管理等优势，但也相对存在着专业性不够强、感情疏离、与农逐利等问题。与上述二者不同的是，农产品加工业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中，不仅具备一定的资本条件，还有着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本身就一头连着加工原料生产、一头连着加工产品市场销售，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不仅处在前延后展的便利位置，而且具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就是说，融合一、二、三产农产品加工业既有天然优势，也本身就是它的天性。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力自建原料基地和市场网络，早已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体。另一方面，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业时间较长，对农业既具有深厚的感情，也具有专业的人才技术等积累，支持农业发展更容易做到得心应手。加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庞大，2014年主营业务收入已超过18万亿元，总产值已是农业的2.1倍，成为举足轻重的部门，对农村乃至全国产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具有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实力。这些情况表明，把农产品加工业定位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关键最重要的业态十分必要。此外，近年来休闲农业发展突飞猛进，且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度体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理念，市场空间十分广阔，也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值得高度重视和借力的重要业态。

明确融合的主体在新型经营体系。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千家万户的农民都要行动起来，但由于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特别是传统小农户很难在推进融合发展上发挥大的作用。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既要调动广大传统小农户的积极性，更要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目前，我国共有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40万家；各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其中省级以上1万家，国家级124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00万家左右，50亩以上的规模化经营农户317.6万户。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不同领域实践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和要求，应在今后推进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激发他们的更大活力，推动其发挥更大的生力军作用。

明确融合的保障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在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不能够包办，也无法包办。但是，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加强规划引领。特别是在当前各方认识尚不尽统一、各地工作头绪尚不清晰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规划等指导性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原则方向和目标任务及措施。二是加强示范引导。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及领域，通过总结发现树立一批融合发展的先进典型，加强宣传推广，促进由点到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十分必要。三是加强政策激励。研究制定针对性政策，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得好的地区和经营主体等，通过财政奖补、税收优惠、金融扶持、通报表彰等形式给予适当奖励，推动形成争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良好氛围，构建起长效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机制。

宏观观察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 欧阳俊　邱　琼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海外寻找投资和业务拓展机会。但是，中国企业长期以国内经营为主，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往往对风险估计不足，投资行为盲目莽撞，部分企业甚至目的都不明确，前景、风险都不了解，就轻率投资海外，影响了对外投资效果。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担忧自身利益受损，对后来者不择手段打压，加大了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战略实施造成障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还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都需要讲究策略。

用整体观念指导跨国投资决策

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国家，也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当前推出“走出去”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借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讲，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对具体企业而言，是否进行跨国投资，则须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进行整体考量。企业决定“走出去”之前，必须回答“以什么为投资目的，是否经济可行，如何选择目标区域，如何规避投资风险”，既要考虑跨国投资的长远战略意义和价值，也要关注中短期的投资收益和风险。

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有三种收益回报，即获取资源、占领市场与获得非市场化的资产。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以更便利地利用东道国及其周边廉价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以更好开拓东道国及其周边市场。以获得非市场化资产为目标的，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获得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东道国本地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资产。这些非市场化资产对于企业发展、提升核心能力极具战略性，如技术、工艺、创意、管理等知识型资产。企业决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跨国投资目的。如果资源是企业发展瓶颈，而跨国投资获取资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资源获取为目的。如果拓展市场是企业发展关键，而通过跨国投资开拓市场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如某种境外非市场化资源关系企业发展前景，就可考虑以获取该项资源为目的跨国投资。

“走出去”跨国投资是否经济可行，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竞争优势。若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自身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三是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优势分析需整体考察与三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考察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优势相互作用带来的综合收益增加，足以弥补境外投资劣势造成的成本增加，企业才可考虑进行跨国投资。

根据投资目的选择跨国投资对象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需针对不同区域确立不同目标，制定对外区域投资战略，做好对外区域投资规划。对企业而言，一旦确定“走出去”，就需根据投资目的，结合自身优劣势，按照政府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合理选择投资对象。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美、欧、日最好以技术等非市场化资产获得为目的，不宜以市场占有和资源获取为目的。中国与美欧日之间虽存在一些壁垒，但货物贸易总体上是通畅有效的。而美日欧环境保护和工资福利标准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生产商品或者开采资源形成的成本增加远远高于因此绕过壁垒所带来的收益，故此以市场开拓、资源获取为目的对美欧日投资经济上不可行，以贸易方式开拓市场更为便利和经济。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欧债危机应对改革深入，欧盟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下降，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对欧（特别是东南欧）投资经济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欧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但与货物贸易总体通畅的现状不同，美欧日为保持自身技术创新领先地位，对华设置了种种技术转让壁垒，而技术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非市场化资产属性，中国企业很难通过贸易获得这类资产，只能通过在当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取。

东南亚、非洲、拉美都属于不发达区域，都属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富集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比较而言，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富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劳动生产率更高，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对该地区投资，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绕过欧美日对华贸易壁垒，具备较高经济可行性。拉美、非洲自然资源更为富集，开采成本更低，对其进行投资，可以缓解国际资源能源贸易市场波动的冲击，有助于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为企业“走出去”重点促进领域。其中，拉美较之非洲更为稳定，制度更为健全，更值得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拉美经济整体水平较高，市场空间较大，而拉美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资设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更好开拓当地市场，还可以就近开拓北美市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资设厂更加可行。

前苏联、中东地区是中国企业另两个潜在的“走出去”投资目标，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者，其中前者还是矿产资源出口大国。单纯从经济来讲，对俄罗斯、中东地区进行资源投资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中东地区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俄罗斯对华经济政策多变，对中东、俄罗斯投资将面临巨大的非市场风险，需要认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中亚国家安全风险相对较小，对华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同样是能源资源富集区，以资源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其投资风险较小，经济上也具备可行性，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促进区域。

建立根据地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资经验积累，跨国投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玩家，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压。面对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考虑根据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选择一些国家作为“走出去”突破目标，建立一批企业“走出去”根据地，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管控投资风险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采取建根据地的方式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动作较小、涉及面窄，较之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方式风险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也较小，相对容易取得突破。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地作用明显：根据地是航空客运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直航，实现人员往来便利化；根据地是物流储运中心，将成为中国销往该地区及周边商品的储运分销中心以及该地区及周边准备运往国内的物资储运中心，各种物资储运障碍因此得以消除；根据地是金融服务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间直接汇兑与结算及通过根据地与周边地区间汇兑与结算，保障资金安全、迅速流动；根据地是信息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信息及时传播与交换。显然，一旦根据地建设成功，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将会减少，企业投资成本和风险也将因此而降低。对国家而言，根据地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与中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实现二者间货物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实现贸易与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或者建立货币同盟，实现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随着海外投资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圈，中国经济安全就有了更大的保障。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双边经济合作可能从贸易自由开始，逐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人民币结算、政策协同，最终成为经济货币联盟。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与战争年代根据地建设相似，选择经济落后国家“走出去”相对容易。一方面，经济落后国家需要外来投资，戒备、防范心理较小，接受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意愿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经济落后国家往往发达国家投资少，受关注程度相应较低，推进与这类国家经济一体化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相对较小。除此之外，根据地目标国家选择还应坚持以下条件。一是目标国家应有一定发展潜力。没有发展潜力就没有作为根据地的基础，因为经济上不具备可行性。二是目标国家应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没有区位优势就无法实现辐射周边商品和资源市场，而这正是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之一。三是目标国家与我有一定的合作基础。没有合作基础，对华不友好，彼此缺乏信任，就很难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更谈不上实现高度经济一体化。

践行“三严三实”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上接1版）

二是在提高工作质量上做到又严又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紧紧扭住环境质量改善这个核心，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必须通过提高环保工作质量予以保障。当前，环保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经济发展如果一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是吃祖宗的饭、欠子孙的债，不是真本事；环境保护如果只停留在关停污染企业的层面，环保上去了、经济下去了，也不是真本事。没有保护的发展不行，没有发展的保护也不行，必须坚持辩证法、顾及两方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环保工作。二是就改善环境质量而言，已不再是控制几种常规污染物就能解决，多个污染因子交叉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时空差异更大，仅凭统一的几个约束性污染物控制指标，已难以满足改善环境质量的现实需求。三是从部门协调来看，环保工作越来越依赖于宏观政策，加强部门协调越来越重要。这些新特点新要求，是对我们领导艺术、管理能力和工作质量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以更严更实的标准要求自己，“严”字当头，强化纪律、完善制度，严以律己、追求卓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推动工作；“实”字到底，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为目标，针对突出问题，拿出管用办法，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切实推进环保工作科学化、系统化、法治化、市场化和信息化。

三是在转变工作作风上做到又严又实。检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效果的直接标准是好的作风能否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习惯。环保系统作风建设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从横向看，各部门各单位关联度不强，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从纵向看，不能经常性深入最基层察实情，习惯于传统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从党风廉政建设看，环保系统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中央专项巡视组指出的突出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要下大力气治“漂”、治“浮”、治“虚”，大力培育勤政有为的作风，对懒政庸政怠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严肃问责，对不敢抓不敢管的坚决采取组织措施。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从我做起，发挥表率作用，自觉以忠诚、干净、担当为准则，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名利观，坦坦荡荡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政，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